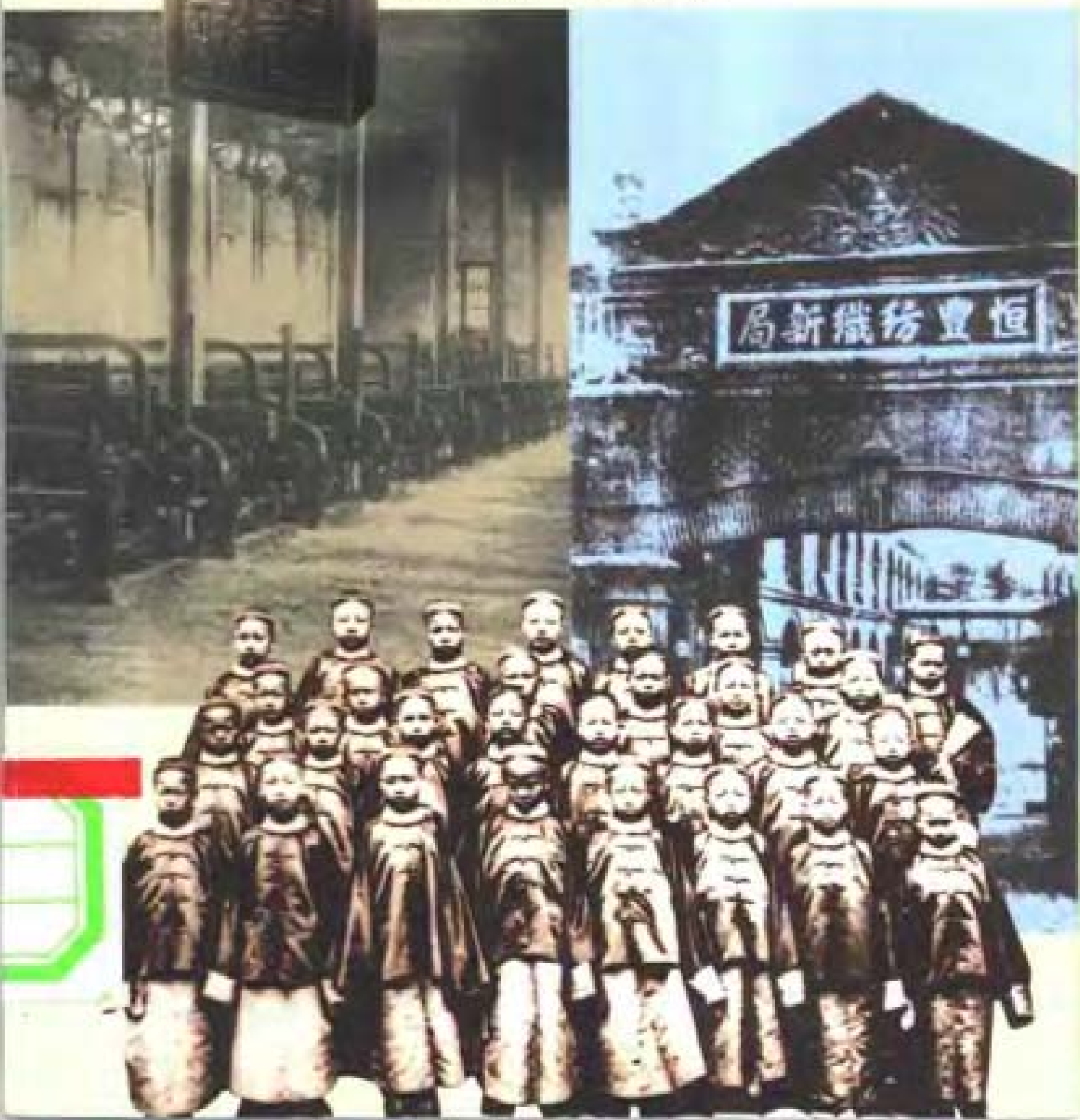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话

(1840~1919)

第四卷 自强求富

夏以溶 主编 吴兆清 著



中国近代史话

(1840~1919)

第四卷 自强求富

夏以溶 主编 吴兆清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史话/夏以溶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ISBN 7-222-02770-X

I. 中... II. 夏... III. 中国—近代史—普及读物 IV. K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998 号

书 名	中国近代史话·第四卷 自强求富
主 编	夏以溶
作 者	吴兆清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厂
规 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222-02770-X/K·268
全套定价	162.00 元

序

戴逸

《中国近代史话（1840～1919）》全书共10卷200余万字，是我国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规模颇大的一种。

江泽民同志1991年3月9日在《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问题》中指出“……编写一本书，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使他们熟悉我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斗争史，认识今天的人民政权来之不易”，《中国近代史话》即是响应这一号召而撰写的。它的出版有现实的意义。

全书通过对 80 年历史的记述，展示了自 1840 年 6 月中英鸦片战争，以清王朝为失败而开端的中国近代史脉络。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外国侵略者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强割中国领土，勒索巨额赔款，控制金融财政，划分势力范围，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束缚了中国人民。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备受列强的欺凌。反帝反封建成为振兴中华的必然使命与首要前提。

备受屈辱、辛酸的近代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中国近代史话》记述了各阶层及其代表人物许多救亡之举，其中，有封建统治者中抵抗派的惊觉与抗争，也有农民群众的奋起斗争；有洋务官员的富国自强实验，也有资产阶级革新派的百日变法维新，从而全方位展现出近代中国各阶层力图御侮救亡，复兴中华的历史概况。

孙中山曾“试图尽力采取一切手段，不经流血而夺取全国和建立政府。”（《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40 页）但是，自 1894 年后，他始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同上第 52 页）他认识到了暴力革命之必不可无。孙中山由上书李鸿章倡议革新转而结党举义，以武力推翻清朝，让人们懂得，暴力斗争是拯救中华、御侮复兴的希望所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古老中国，要复兴自强，赶上世界历史潮流，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驾齐驱，首先必须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近代史话》以大量的篇幅，系统和全面地再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前仆后继，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胜利的全过程，并歌颂它揭开了 20 世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功勋。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下，由于其自身的幼稚软弱，未能

在中国确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和完全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因此，中华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落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肩上。这也更深刻地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整个《中国近代史话》，以《大清兴衰》为大背景，顺序以《鸦片战火》、《天国风暴》、《自强求富》、《边陲危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群英探索》、《辛亥硕果》、《捍卫共和》等卷，一脉相承地次第展开，从而使各卷的历史主题鲜明、事件相对集中，首尾完整而互为照应。

记事本末体裁的《中国近代史话》，写史严谨，叙事清晰，记人真实，线索清楚，文字简洁、通畅，是一部学术著作通俗化的好书。

历史已进入 21 世纪，伟大的辛亥革命 90 周年即将来到，在这富有纪念意义的时日出版篇幅宏大的《中国近代史话》，展示中国民主革命的绚丽图卷，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衷心祝贺《中国近代史话（1840～1919）》的出版。

2001 年 1 月 12 日

主 编: 夏以溶

编 委: 胡廷武 欧阳常贵 王建南
邓绍辉 汤明珠 王瑞成 罗大明

专 家 组: 谢本书 赵 洁 伍宗华 刘如仲
孙代兴 高整军 郑 诚 吴廷才

组 稿: 吴 虹

责任编辑: 唐贵明



徐寿像



北京同文馆旧址

目录

1	第 61 回	观世界中华落伍	求富强大潮涌动
14	第 62 回	设总署奕訢主政	谋政变慈禧垂帘
31	第 63 回	引狼入借师助剿	演闹剧洋人舰队
48	第 64 回	曾国藩创军械所	徐雪村造蒸气船
60	第 65 回	采西学横遭非议	倡同文大势所趋
75	第 66 回	造枪炮苏沪建厂	兴机器金陵设局
90	第 67 回	办船政左沈接力	请裁撤宋晋受挫
105	第 68 回	李鸿章设厂先导	机器局遍地开花
123	第 69 回	选幼童赴美留学	派生徒师夷长技
139	第 70 回	招商局官督商办	争利权华洋角逐
154	第 71 回	沈葆楨基隆兴矿	唐廷枢开平赴任
170	第 72 回	李金镛漠河采金	鲁滇黔矿业初兴
185	第 73 回	官商办电报电话	通讯连东西南北
201	第 74 回	李鸿章创筑铁路	顽固派群起搏击
215	第 75 回	左宗棠总督陕甘	织呢局奠基兰州
227	第 76 回	郑观应办织布局	盛宣怀扩华盛厂
243	第 77 回	仿西洋配置枪炮	裁营勇组建练军
259	第 78 回	办学堂水师勃兴	育人才海疆固防
275	第 79 回	奕訢掌海军衙门	清廷编南北舰队
288	第 80 回	刘铭传抚台建省	张之洞督鄂修厂

第 61 回 观世界中华落伍 求富强大潮涌动

话说 1860 年的某一天，湘军大将胡林翼带兵镇压太平天国，途径安徽当涂采石矶，就是大诗人李白当年投江捞月的地方，正登高远眺，忽然看见从下游逆流驶上一只大船来。这只船不用风帆，不用纤夫，在湍急的江流中快速上行，船头冒着黑烟，俨然是一只怪物。待船驶近，才发现是一只挂着外国旗的洋船。这一幕，直看得胡林翼心惊肉跳，只说了一句：“这世道要变了”，便昏倒在地。

不错，这世道确实要变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在经历了天数的辉煌和荣耀之后，已经落在我们所鄙夷的“西夷”之后。

早在 20 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西第一次正面交锋，双方的优劣差距便暴露无遗。

火药和管型火器都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一直处于前科学时期，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和实验体系，使得中国火器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至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制作的。就型制样式而言，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了 200 余年。

清军使用的鸟枪，其原型可追溯至 1548 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此后几经改良，成为主要单兵火器之一。

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根据《皇朝礼器图式

火器》，清军鸟枪的种类达 58 种之多，大同小异。其中装备最多的是兵丁鸟枪。

兵丁鸟枪用铁制成，枪长 2.01 米，铅弹丸重 1 钱，装填火药 3 钱，射程约 100 米。射速为 1 至 2 发/分钟。

英军此时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两种军用枪：一是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其点火装置为磨擦燧石。枪身長 1.16 米，口径为 15.3 毫米，弹丸重 35 克。射程约 200 米。射速为 2 至发/分钟。该枪约 1800 年研制成功，后装备部队。二是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点火装置为击发枪机撞击火帽。枪身長 1.42 米，口径为 17.5 毫米，弹丸重 53 克，射程约 300 米，射速为 3 至 4 发/分钟。该枪约在 18384 年起陆续装备部队。

由此可以看出，与英军相比，清军鸟枪在型制上的缺陷是：枪身太长（装药、填弹和射击均为不便）；点火装置落后（风雨天效能极差）。而在性能上，又有着射速慢、射程近这两大致命伤。如果我们以射速、射程的参数对照，大致可以推论：两支兵丁鸟枪不敌一支伯克式枪；而一支布伦士威克枪，可顶五支兵丁鸟枪。如果再考虑到由制造工艺而引起的射击精度这一要素，这种差别恐怕还得加倍。

对照中、英武器装备，差距最大者，莫过于舰船。

英国海军为当时世界之最，拥有各类舰船 400 余艘。其主要作战军舰仍为木制风帆动力，似与清军同类，但相较之下，有下列特点：一、用坚实木料制作，能抗风涛而涉远洋；二、船体下部为双层，抗沉性能好（当时中国人称“夹板船”），且用铜片等金属材料包裹，防蛀防朽防火；三、船上有两桅或三桅，悬挂数十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四、军舰较大，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五、安炮较多，从 10 至 120 门不等。此外，诞生于工业革命末期的蒸汽动

力铁壳明轮船，也于19世纪30年代起装备海军。尽管此时的轮船吨位小，安炮少，在西方正式海战中难期得力，在海军中也不占主导地位；但因其航速快、机动性能强、吃水浅等特点，在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沿海和内河横行肆虐。

清军的海军，时称“水师”，主要有两支：一为福建水师，一为广东水师。其它沿海省份，亦有执行水师任务的镇、协、营，如浙江的定海水师镇，盛京的旅顺水师营，等等。然清军水师的任务却非出洋作战，而是近海巡缉，守卫海岩。“天朝”的水师并不以哪一国的舰队为作战对象，其对手仅仅是海盗。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本相当于海岸警卫队。

正因为如此，清朝水师的主要兵力，并不是在舰船上或为舰船服务的勤务分队中，而是驻守于沿海、沿江的众多炮台、城寨、要隘。许多海防要地，如厦门、虎门、舟山等，其陆上防守全由水师负责。

从数量上讲，清军水师舰船也有数百艘之多；从种类上讲，清军战船样式亦达数十种；但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船小。清军最大之战船，其吨位尚不如英军等外级军舰，清军安炮最多之战船，其火炮数量也只相当于英军等外级军舰，清军安炮最多之战船，其火炮数量也只相当于英军安炮最少之军舰。至于其它的弱点，当时人亦有清醒的认识。闽浙总督邓廷桢对此作过评论，除未涉及舰船的帆索、航速等技术外（很可能邓廷桢未有航海经验，对此不甚了解），对船体的质量、火炮的数量、炮手的安全等问题，都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他的结论是：“船炮之力实不相敌”，“此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

不是说当时中国的造船业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此时也造出过比战船更大更坚固的远洋商船。这里就涉及到邓奏

中提到的“部定则例”。清朝的战船样式大体是在乾隆年间固定下来的，并用“工部军器则例”、“户部军需则例”等条规确定其样式和修造军费。这就自我限制了战船的发展。各地没有更多的钱去制造更大更好的军舰。为了保持水师战船对民船的某种优势，清朝又反过来规定民船的大小尺寸，限定民船出海时火器、粮食、淡水的携带数量。这么一个循环，严重滞碍了中国的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

即便是如此落后的水师师船，其完好在航率仍是很低的。例如，鸦片战争前，福建水师共有大小战船 242 艘，除去修理未竣、应届修期、被风击碎者外，在营驾驶者 118 艘，在航率仅 48.8%。又如，浙江定海水师镇共有战船 77 艘，遭风击碎、修理未竣者达 30 艘，在航率仅 61.2%。

中英舰船水平的悬殊差距，使得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根本不敢以水师出海迎战英军舰队，迫使清军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这种由装备而限定的战略决策，实际使清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军凭借其强大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

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古老民族，要承认落后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就有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反省中国贫弱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救国的主张。林则徐是我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长时期的闭关政策，使林则徐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那种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愚昧与偏见。他曾认为，西方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无以为命。但林则徐在与英军交战中，认识到西方武器优于清军，他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进而他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

号。为了抵抗侵略，林则徐不仅买洋枪，而且尝试按西洋造炮方法制造精良武器。他还建议清政府用海关税收开办军工厂，造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

魏源比林则徐前进了一步。他不但在中西武器差距上与林则徐的认识类似，而且明确的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建议在广东设立造船厂与火器局，除修造军用器械外，也可制造民用商船、蒸汽磨、弹簧秤等。他还提议在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地，听任商民自由集资开设厂局，制造轮船或机械，听任自用或出售。这表明魏源要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比林则徐单纯在军事技术上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高明。

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有识之士从中外对比中，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就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改变当时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状况，因此，介绍西方的著作不断涌现。1840年，林则徐为了反抗英国侵略的需要，搜集有关西方的情况，编译了《四洲志》，该书主要记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1842年，魏源以《四洲志》为蓝本，根据鸦片战争的实践经验，编著了《海国图志》60卷。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又有1846年姚莹的《康輶纪行》、1848年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稍后夏燮的《中西纪事》等书。他们的目的是要“知彼虚实”，“筹制夷之策”，“雪中国之耻，重海疆之防。”

1860年，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其中有《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专文谈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重要的是冯桂芬在该书中最早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就是说在保持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上，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求富强。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湘淮军首领，也亲身体会到西洋武器的威力，并从中尝到了甜头。事实上，清朝统治者正是利用了洋兵洋军火才迅速扑灭了农民革命军。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要不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勾结洋枪队，利用西方武器武装自己，是不会在短期内被镇压下去的。攻杀清帅僧格林沁和歼灭曾国藩新湘勇而声威大振的赖文光捻军部，要不是遇着全副洋式武装的李鸿章淮军劲敌，也不会在短期内被镇压下去的。洋务派人物对西洋武器的威力都有所认识，曾国藩曾说：“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炮，剿贼必能得力。”1862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亲眼看到洋兵使用新式武器剿杀太平军的威力，更加赞不绝口。他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于是，李鸿章在上海高价向外国商人购买并设局仿造新式武器，至1865年仅仅三年时间，淮军已是一支拥有西洋武器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由于洋务派对西式武器的迷信，及镇压人民革命的急需，便在60年代初期，大张旗鼓的掀起了练兵和购买仿制西式枪炮轮船的洋务运动。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奕訢对李鸿章等人在江苏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和购买外国军火，镇压太平军取得的效果，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说：“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攻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这些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督抚大员，便是后来领导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洋务派是相对于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的顽固派而言的。他们是在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下，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官僚地主。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訢，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主持人；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张之洞、刘铭传、丁日昌、郭嵩焘等。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朝统治者面临着内忧外患。185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洋务派官僚纷纷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改变中国的落后贫弱现状，以求富强，从而维护清朝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出现了洋务热潮，“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

恭亲王奕訢说：“外忧内患，至今已极”，所以在1860年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封建官僚中最早的洋务派人物。1860年12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他就指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61年8月，他再次重申“师夷智”以制造炮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其对内镇压，对外御侮的双重目的。他指出：轮船航行速度快，洋炮射程远，在英国则自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罕见而惊奇。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失其依靠。购成之后，“访慕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他广泛罗致懂科技通洋务的专门人才破格任用，他在短短的几年内提拔、重用、保荐了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沈葆楨等一大批洋务人才。曾国藩实为洋务派首领和骨干。

左宗棠办洋务有坚定的御侮目的，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持强硬态度。60年代初，他说：“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他又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德、俄又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面人，无